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OF BOSTON

FROM 1630 TO 1880

卷一 殖民地时期

佛曆二五三一年九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42

(全一百冊)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鎌田茂雄

本書譯者：鄭彭年

編者：藍吉富

發行人：朱將元

出版者：華宇出版社

社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話：(〇二)九四二六六七四・二四七七三七二

郵撥：〇〇一七六二五—三號朱將元帳戶

行政院
新聞局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42

簡明中國佛教史

鎌田茂雄 著
鄭彭年 譯

華宇出版社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台灣省第十九屆佛教會理事長
高雄勸大崗山超華寺住持

法智大師



有了一世界佛學名著譯叢——這部大套書，不須仰賴他人，自己精研佛學，就算耗費一輩子來求知，磨練自己，也不會令人覺得厭煩，吾人要感謝古聖先賢，他們終其一生殫精竭慮為後世留下佳作。

法智 敬贈

佛曆二五三九年十二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一

白聖大師序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卍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借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濤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滙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為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

、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為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為艱難。謂之為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二

印順大師序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

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順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三

星雲大師序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為

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
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日
生
雲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四

淨心大師序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之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

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五

演培大師序

自釋尊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歷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為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

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荐。

適如

永惺大師序

兩千多年來，佛教在亞洲各國的弘傳，大體發展成下列六大系統。此即印度佛教、南傳佛教、中亞佛教、中國佛教、西藏佛教、與日韓佛教。這六大系統之中，除了印度與中亞兩大系統已告衰竭之外、其餘各系統都仍然是該地區人民的重要宗教信仰。佛教對世界影響之大、佛法瀰漫人間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我國舊日的佛教研究，一向局限於傳統中國佛教內涵的探索，對於其他各系的教義發展及傳播，較少專著出現。因此，一般人除了知道一些印度佛教的皮毛之外，對中亞、西藏、南傳、及日韓各系、往往毫無所知。在國際關係至為頻繁的今日，這不能不說是是一項缺憾。

近數年來，對這一問題開始措意的學界人士、漸不乏人、而作大規模介紹的，當以華宇出版社這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為最受矚目。這部譯叢不祇介紹世界各系的佛教，而且也遙譯甚多二十世紀的嶄新佛教研究成果。因此，這不祇可以擴大國人的佛教研究視野，而且也可為國內的佛學研究，作一次紮根工作。這種氣魄與願力，實在值得讚嘆隨喜。

余弘化香江多年，對佛教文化與教育的關懷，一

直未敢稍懈，因此，看到華宇出版社推出這部皇皇巨著，乃頗有「深得我心」的感覺。一九八六年歲末，華宇出版社朱蔣居士與佛教學者藍吉富教授來香港造訪，為「譯叢」索序於余，故略贅數語，以為之序。

釋永惺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七

聖印大師序

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人類知識的爆發性進展，使佛教的研究與信仰方式，也產生極大的變化。不論研究者或信仰者，對於佛教的認識與研索態度，都愈來愈深入，愈來愈不盲從。

在這種情勢下，現代的弘法人員，如果只沿襲舊有的方式、一成不變地從事弘法工作的話，恐怕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更難以使那些喜好深入理解佛法的現代知識份子感到滿足。職是之故，吸收融滙國際學術界的佛教研究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並以之為弘法素材，這應是目下佛教弘法人員的當務之急。

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有鑒於此，乃聘請佛教文獻學者藍吉富居士及青年學者多人，成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費時歷四年，耗資數千萬，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國際佛學名著達百冊之數。像這樣龐大的文化事業，設非發大心、弘大法者，何能如此！

衲衲為弘法工作者之一員，數十年來奔走海內外，深知佛教弘法事業之甘苦，更深知佛教文化事業之不易為。因此，對朱居士之大氣魄、大發心，深感讚嘆。朱居士徵序於予，隨喜之餘，爰贅數語如此。

聖印

編者序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爲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濶；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

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董吉富

出版前言

由於日本佛教並不是直接從印度輸入，而是源自中國，因此，從早期的日本學僧以迄現代日本的佛教學者，對中國佛教大抵都能有基本的理解。他們不只對中國佛教懷有親切感，而且能閱讀中文佛典。在這種文化背景之下，現代日本的佛教學界，其所以有汗牛充棟的中國佛教研究著作，也就不足為奇了。

本書是日本學者鎌田茂雄博士（1927— ）所撰。鎌田先生是當代日本佛學界飲譽最隆的中國佛教專家。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自一九六五年以來的十餘年間，由於他在中國華嚴宗（尤其是華嚴五祖圭峯宗密）的研究領域裏，具有相當不錯的研究成果，因此，在日本佛學界裏，他被視為華嚴學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之一。後來，鎌田博士又開始全面探討中國佛教史。一九七八年，他出版了第一部有關中國佛教通史的著作（即「譯叢」所收的這部書）。到一九八一年，他又開始撰寫全書共計八鉅冊的「中國佛教史」。儘管迄今為止全書仍未出齊（台灣有關世謙先生譯本，佛光版，已出三冊），但是，他已被國際學術界視為目前日本之現存學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國佛教史專家之一。

本書原名「中國佛教史」，與作者後來所撰八冊本的「中國佛教史」鉅著相較，可以說是一部中國佛教史的綱要書。所以譯者鄭彭年先生才將它易名為「簡明中國佛教史」。日文原

書爲日本岩波書店所發行，鄭先生所譯，根據的是一九八〇年的第三版。除了原書的附註之外，譯者也附加了不少註釋，俾使初學者閱讀。

譯 者 的 話

佛教傳入中國，已有近兩千年歷史了。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佛教適應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形成了它自己的教義和學說。中國佛教史的發展，也表明它與當時的社會制度、階級利益的關係十分密切。正因為中國佛教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發展成長起來的，因而具有中國的特點，並已成為中國的傳統思想的組成部分。佛教思想對於中國哲學、文學、藝術和民間風俗都有一定影響。

本書作者鎌田茂雄教授是日本當代著名佛教史家，著有許多佛教專著。本書提綱挈領地對中國佛教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作了較為系統的敘述，寫得簡明易懂，可以當作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入門書。

本書原名為《中國佛教史》，今徵得作者同意，將譯本改名為《簡明中國佛教史》。為便於一般讀者閱讀，譯者對一些專門名詞作了必要的注釋（未寫明譯者注的，均係作者原注）。

書中的引文，除了極少數外，均逐一核對我國有關佛教史籍，並注明出處。在翻譯過程中，承蒙作者多次給予幫助，在此深表謝意。

由於譯者水平有限，錯誤之處，請讀者批評指正。

鄭彭年

一九八四年八月

序

佛教起源於印度，經中亞細亞傳到中國，並以中國爲中心，傳到渤海國、朝鮮、日本、越南等廣大地區，形成了一個東亞佛教文化圈。其中，中國佛教的教理體系最發達。研究印度佛教史，必須掌握西藏佛教的資料；理解南北朝以前的印度佛教史，必須具備中國佛教的知識；研究直接以中國佛教爲母胎的日本佛教和朝鮮佛教，缺乏中國佛教的知識也是不行的。

明治四三年（1910），《佛教史林》的出版掀起了一股研究佛教史的熱潮，許多前輩人士作出了出色的成績。但他們是以研究教理的發展與變遷爲主，極而言之，不過是用近代研究法繼承和發展凝然〔1〕的《三國佛法傳通緣起》〔2〕的思想。

然而，自昭和一二年（1937）創立“中國佛教史學會”以來，才使中國佛教史和中國文化史、社會史聯繫起來進行研究創造了條件，才使全面掌握教理、教團、美術、文學、法制、經濟等一切方面的佛教文化史研究成爲中國佛教史研究的主流，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該會所刊行的《中國佛教史學》（全書共七卷）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該會還根據實際調查進行中國佛教史蹟的研究；美術史家們則對敦煌、雲岡、龍門諸石窟和房山石經等進行了現場調查，發表了巨大的研究成果。進而根據敦煌文獻開始了三階教〔3〕和禪宗史的研究。關於義邑

〔4〕、礎礎〔5〕、變文〔6〕等方面的社會經濟史和通俗文學史等的闡明也迅速取得了進展，開拓了新的領域，中國佛教史的面目遂大為改觀。

可是自昭和一二年出版《中國佛教史學》，進行中國佛教的學術性研究以來，還只經過四十餘年的歲月，可以說，研究中國佛教還是一門極其年輕的學問。在研究中國佛教時，除印度佛教學外，還不能不進一步與中國史、中國思想史、道教史等各個鄰近的領域密切聯繫起來進行深入的研究，迄今尚未開拓的領域實在太多了。在這種現況下，想要完整地掌握中國佛教史這件事本身只能說是一種近乎魯莽的嘗試。特別是我，不過專攻中國佛教的一個宗派——華嚴宗的教理史，所見很是狹隘，所以本書的內容主要是依據前人的業績加以闡述而已。然而前人的著作浩如烟海，要完全理解、消化和記述這些東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本書既不偏重教理史，也不偏重教團史，採取通史的形式加以敘述，旨在闡明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如何變成中國式佛教，以及爲了適應漢民族的特點，在其精神生活中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佛教在中國的變遷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國家權力與佛教教團的關係非常密切。因而本書著重闡述政治與佛教、社會與佛教的關係。又因篇幅關係，隋唐佛教諸宗派的教理寫得盡量簡略一些；讀者可以多多參考各節附錄關於宗派的概論性著作〔7〕。

作者自有志於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以來，已經有二十年時間了，可是進展緩慢，今以本書的出版爲契機，希望把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向前推進一步。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多蒙前輩諸好友

大力支持，特別在校對時，承駒澤大學副教授岡部和雄先生及其同好給予不少具體的幫助，岩波書店編輯部木村秀彥、加藤亮三兩位先生更對本書的出版自始至終關切備之，我都應一併在此致以深切的謝意！

鎌田茂雄

一九七八年十月一日於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註：

〔1〕 日本東大寺戒壇院僧侶。——譯者

〔2〕 日本鎌倉時代凝然寫的印度、中國、日本佛教史。——譯者

〔3〕 也叫普法宗，隋朝信行根據地藏十輪經的學說而創立的宗派。——譯者

〔4〕 以在俗佛教徒為中心而組成的信仰集團。——譯者

〔5〕 用水力發動的脫穀製粉的石臼。——譯者

〔6〕 韻文和散文混合的通俗文學。——譯者

〔7〕 見各節的作者原注。——譯者

有關書刊簡稱表

〈石田論叢〉 石田博士祝壽紀念《東洋史論叢》，石田博士七十壽辰紀念事業會，昭和四〇年（1965）。

〈市村論叢〉 市村博士七十壽辰紀念《東洋史論叢》，富山房，昭和八年（1933）。

〈加藤集說〉 加藤博士花甲紀念《東洋史集說》，富山房，昭和一六年（1941）。

〈神田論集〉 神田博士花甲紀念《書志學論集》，平凡社，昭和三年（1957）。

〈櫛田研究〉 櫛田博士祝壽紀念《高僧傳研究》，山喜房佛書林，昭和四八年（1973）。

〈塚本論集〉 塚本博士祝壽紀念《佛教史學論集》，塚本博士祝壽紀念會，昭和三六年（1961）。

〈常盤論集〉 常盤博士花甲紀念《佛教論叢》，弘文堂，昭和八年（1933）。

〈干潟論集〉 《干潟博士七十壽辰紀念論文集》，干潟博士七十壽辰紀念會，昭和三九年（1964）。

〈福井思想論集〉 福井博士祝壽紀念《東洋思想論集》，福井博士祝壽紀念論文刊行會，昭和三五年（1960）。

〈福井文化論集〉 福井博士祝壽紀念《東洋文化論集》，早稻田大學出版部，昭和四四年（1969）。

《山口論集》 山口博士花甲紀念《印度學佛教學論叢》
，法藏館，昭和三〇年（1955）。

《結城論集》 結城教授祝壽紀念《佛教思想史論集》，
大藏出版，昭和三九年（1964）。

《印佛研》 《印度佛教學研究》。

《日佛年報》 《日本佛教學會年報》。

《日華年報》 《日華佛教研究會年報》。

《東研紀要》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中佛史學》 《中國佛教史學》。

《正藏》 《大正新修大藏經》。

《續藏》 《大日本續藏經》。

《梁傳》 《梁高僧傳》。

《唐傳》 《唐高僧傳》。

《宋傳》 《宋高僧傳》。

序 章 中國佛教在歷史上的性質

文化交流 印度文化圈和中國文化圈是形成於古代亞洲的兩大文化圈。地理上，這兩個文化圈同存於亞洲大陸之內，儘管陸地連接，但被西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脈隔斷，因而形成了完全異質的文化圈。不用說氣候、風土等自然條件，連人種、語言、風俗習慣、社會結構等也有顯著不同。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印度吠陀文明〔1〕繁榮，中國則殷周^六，昌隆。佛教的開山祖師釋迦牟尼所活動的公元前五至四世紀光景，相當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也是孔子、老子及其他許多思想家百家爭鳴的時代。

公元前二世紀末，開闢了橫斷中亞細亞的交通路線。從那時候起，這兩種相隔離的文化才開始進行交流。張騫回國（前126）以後，西自羅馬帝國東至長安的絲綢之路被打通，依靠東西交通的通商貿易擴大了。這是中國經營西域的結果。

佛教從印度西北部傳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絲綢之路的商隊一起逐漸傳到中國。在印度，不僅印度教深入民衆之中，而且耆那（Jaina）教及其它各種宗教也都很發達。但是，只有作為印度宗教旁系的佛教傳到中亞細亞，進而傳入中國。這不只是歷史上的偶然現象，可能由於佛教本身具有一種潛在力，它的傳播和滲透是超民族、超階級的。

佛教不僅從印度西北部經中亞細亞傳到中國，而且還繞過

蘇門答臘、馬來半島，經由南海路線，通過越南傳到中國。不僅是印度僧與西域僧來到中國，法顯、玄奘、義淨等中國僧爲了朝拜釋迦誕生的印度聖地和搜集佛典，也歷盡艱難，度過漫長歲月，周游印度、西域之後，仍回到了中國。由於不斷進行這樣的文化交流，佛教就逐漸傳到異質文化圈的中國來了。

漢譯《大藏經》 傳入中國的經典除《陀羅尼經》外，全部譯成了漢語。這是中國人對文字抱有的優越感和引以自傲的中華意識的表現，是用自己的語言來理解佛教的結果。因此，從佛教傳入中國至唐朝，翻譯經典被當做最主要的事業，自後漢以後到宋朝的一千年間，一直持續進行。使玄奘完成翻譯事業的翻經院這樣的國家機構，有組織地進行翻譯，終於完成了世界翻譯史上規模無比龐大的漢譯《大藏經》。中國佛教就是根據這部漢譯《大藏經》而形成的。東亞佛教圈則是和漢字文化圈的形成相結合而傳播漢譯經典的。中國佛教徒不僅翻譯經典，還寫了許多佛教典籍。

傳播大乘佛教 中國佛教是大乘〔2〕佛教，這點與斯里蘭卡、緬甸、泰國等南方佛教極爲不同。大乘佛教在中國得到發展，形成了天台宗、華嚴宗的教理，產生了禪和淨土的實踐宗教。從印度佛教發展史來說，小乘〔3〕佛教比原始佛教發達，後來大乘佛教興起，中國接受佛教的時代正當印度大乘佛教昌盛的時候，因而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佛教與印度佛教的發展階段毫無關係，最先流入中國的主要是大乘佛教。構成大乘佛教骨幹的《般若經》早已由後漢的支婁迦讖（Lokakṣema）翻譯成漢語。其後，鳩摩羅什（Kumārajīva）翻譯介紹了《法華經》、《維摩經》等大乘經典，以及《中論》、《百論

》等大乘論。在此前後，阿含、本緣部等諸經典以及《阿毗曇論》等小乘論被翻譯成漢語。爲此，中國佛教徒不得不認真對待大乘和小乘的問題。由於對諸經典的價值進行判斷，產生了對教相的判斷解釋。中國佛教徒最初從大乘佛教出發，專門探討大乘佛教的真正意義，終於開拓了使大小乘成爲一個整體的一乘佛教的教理，並進一步加以實踐，產生了中國獨自的佛教——禪宗和淨土教。

中國佛教在歷史上的意義 中國佛教基於漢譯《大藏經》，確立了一乘佛教的理想，並傳播到東亞，特別是朝鮮和日本，成爲這些國家的源流。初期日本佛教深受朝鮮佛教的影響，進入奈良時代以後，則攝取中國佛教，而且以中國佛教之精華——一乘思想爲出發點，終於創造了鎌倉佛教。它與中國佛教不同，有簡單明瞭的實踐法。要是中國沒有發達的一乘佛教，那麼大乘佛教在日本也始終不會得到發展。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存在著儒教以及諸子百家的傑出政治倫理思想，但在宗教思想和宗教文化方面則有其不足的一面。攝取了佛教以後，便使中國思想界擴大了認識的廣度和深度，從而豐富了它的內容，對各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儒教方面完成了宋學和陽明學；道教方面發展了道教禮儀和教義；即使在工藝美術、天文教學、音樂、醫學等方面，也由於攝取印度和西域的文化要素而更加豐富了它的內容。

佛教還豐富了中國人民大眾的信仰生活。進入宋朝以後，佛教是和儒教一起被當作生活的智慧而接受的，明朝出現了像《菜根譚》〔4〕那樣的人生故事書。再者，一般民衆還同時信仰關帝和觀音而進行祭祀活動，不感覺兩者之間有任何矛盾